

一种虚浮无根的女性主义理论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细读和批判

吕保田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盖尔·卢宾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是一篇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文献。然而,它的理论建构方式却不具有健全的综合意义,而是片面地走上了形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依托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以求达成解构的目的。它的思想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对待前人理论遗产的态度往往是断章取义、主观发挥的。它过分地强调“性/社会性别制度”的自足性和优先性,将它视为导致女性压迫的根源。因此,它所提出的女性解放方案也就仅仅是从这个制度上来着眼的,而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方面来考虑的。总之,从宏观的理论设计到具体的理论阐释,盖尔·卢宾都存在着严重的脱根失据的问题。

关键词:盖尔·卢宾;“性/社会性别制度”;女性主义;结构人类学;精神分析学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2-0064-05

1975年,美国人类学者盖尔·卢宾(Gayle Rubin)发表了《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审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女性社会压迫问题的解释限度,对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作出了女性主义的引申,批判了弗洛伊德在性别理论上的生物决定论和性欲中心论,汲取了拉康精神分析学在女性心理解释方面集文化阐释、符号解读与精神分析于一炉的方法论优点,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the sex/gender system)的概念和理论。盖尔·卢宾的这一理论创见意味着女性主义名副其实地获得了理论化的品质,从一种道德化和政治化的激进抗辩变成了系统化的、具有历史检视能力和文化洞见的、可操作的女性主义话语分析理论。无需赘言,盖尔·卢宾的这一贡献已经为女性理论研究界广泛认可。然而,这一理论建构的可靠性究竟如何还需要予以严格的检验。

盖尔·卢宾的这篇论文的开篇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性别问题的研究论域中予以讨论。在宏观的方法论层面,盖尔·卢宾似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宣称“女性”在其本质上不是单纯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需要将其放置在社会关系中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盖尔·卢宾首先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断:“一个黑奴是什么人?他是一个黑种人。可这个解释就跟没

收稿日期:2015-09-15

作者简介:吕保田(1969-),男,河北南皮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解释一样。一个黑人就是一个黑人。他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奴隶。”进而推论道：“我们同样可以问：一个顺从的女人是个什么人？她是人类雌性中的一员。可这个解释就跟没解释一样。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秘书。”^[123]盖尔·卢宾的这种亦步亦趋的态度表明她仿佛要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并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女性问题的研究上来。然而接下来，盖尔·卢宾宣称：“我们必须运用像马克思阅读在他之前的经典政治经济学家著作的方法，来阅读他们的分析与描述。在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和列维-施特劳斯同李嘉图和史密斯相似。”^[124]显然，她要效仿马克思对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另译为“亚当·史密斯”）的超越之路，试图挖掘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自身所没有意识到的、而于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大有可为的潜力，从而开创她的卓越的女性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创构实际上是把人类思想被肢解的两个领域进行了有机的综合，即让物质生产论域的抽象理论突破自身的囿限而通达意识形态，同时也让意识形态论域的玄学下行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上来。当盖尔·卢宾不真正懂得将天空的云霓和坚实的大地予以融通的必要性的时候，她也就不可能为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找到相反相成的对称面。相反，马克思既看到了具有物化功利意义的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也看到了具有某种玄学趣味的费尔巴哈、黑格尔、傅里叶和欧文。如果说马克思是用一双彼此审视的眼睛来考量自己的创新战略的，盖尔·卢宾就是在用波吕斐摩斯那样的“独眼”来考量她的理论建构的。正因为这一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才是具有广阔性、丰富性、复杂性、辩证性和有机性的一体多维的体系，而盖尔·卢宾则是在发展一种“画地为牢”的女性主义形而上学。运用结构主义的列维-施特劳斯也许只能教给她去假定一种内部封闭运算的符号学方法，而弗洛伊德和拉康所具有的心理医生的职业思维则会诱导她更多地把心理问题当作心理问题来对待。盖尔·卢宾没有充分意识到列维-施特劳斯、弗洛伊德和拉康会将她引向见木不见林的、形而上学的研究道路。她所发明的“性/社会性别制度”这个概念工具仅仅“能够构建对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的描述”^[125]，这无可指责；而她没有一个透视全部社会结构的理论背景，没有想过她的小切口的研究如何才能通达整体的社会生活，这就很成问题了。一种健全意义上的专门化理论总是有它相反的极性，一方面要保证它内在的自足性，另一方面也要预留突破自身囿限的出口。因为，真正的思想大家并不对单一的专门化理论孜孜以求，而是要在不同的向度打开多样的思想窗口，并且最终要使它们综合为宏伟建筑。盖尔·卢宾足够清楚她的那种理论创构需要择取哪些有用的理论资源，却不懂得通过广泛摄取相反相成的多样理论资源来成就伟大的综合。

二

盖尔·卢宾不仅在理论创构的总体构想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在具体进行她的批判、借鉴和改造工作时也问题重重。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盖尔·卢宾有理由被人们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来看待。她设想“对性/社会性别制度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性/社会性别制度并不是脱离历史的、人类幻想出来的东西，它们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126-127]。然而，从她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具体研判来看，倒是可以看出她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由于时代和现实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首要的革命性任务就是揭开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压迫问题的论述自然也就有了具体的限定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指导意义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既有的具体理论所具有的具体限定性也不可否认。因为后者而否定前者，这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惯用的伎俩。“解释妇女对资本主义的用处是一回事，以这个用处来说明妇女压迫的根源则是另外一回事”^[127]。即使盖尔·卢宾这样来评判马克思主义从资本分析

得来的那种妇女压迫理论,我们仍不能武断地认定她就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另外的两处证据却能够足够有力地揭穿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她借故马克思意识到在经济原因之外“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成分进入了对劳动力价值的测定”,有意发挥道:“正是这个‘历史的和道德的成分’决定了一个‘妻子’是一个工人的必需品之一、女人而不是男人做家务,以及资本主义继承的一个悠久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女人不能继承遗产,不能当领袖,不能与上帝对话。”^[128]马克思承认“历史的和道德的成分”所具有的影响力,绝不意味着他将这一影响力凌驾于社会物质基础的决定地位之上。盖尔·卢宾凭什么就认为“正是这个‘历史的和道德的成分’决定了……”呢?这不是断章取义吗?她又借故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两种生产,“一方面是生存手段、食物、衣服和住所的生产,以及为那种生产所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类的繁殖”^[129],再一次有意发挥道:“每个社会都有某种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每个社会也有一个性/社会性别制度。”^[130]盖尔·卢宾的言下之意就是,性/社会性别制度同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至少是一种平行关系。恩格斯承认物质生产与性生产是不同意义上的生产,也承认性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却不等于他就否定了物质生产的决定地位。不同社会组织形式的并存是一回事;而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不是在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上也是等量齐观的,那分明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论是无意,还是故意,盖尔·卢宾又一次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通过这两次断章取义,她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的否定工作。正如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简单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并以“非经济决定论”的颠覆策略支持他们所谓的超越和创新一样,盖尔·卢宾独尊“性/社会性别制度”这一中心化的概念工具,实际上就是要替换“物质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应当占据的最高位置。这样一个瓦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又怎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呢?

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盖尔·卢宾把寻求女性主义理论出路的眼光投向了结构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可是,她仅仅发挥了这两种理论遗产的女性理论潜力,而遮蔽了此外的理论可能性。在精神分析学方面,她对拉康则青眼相加;而对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她也抱有激赏的态度。这两个思想家都得益于结构主义。这也启发盖尔·卢宾将结构主义运用到女性理论上来。女性主义地来运用结构主义,这没问题;而女性主义地来框限结构主义,这就是个问题。盖尔·卢宾只关心整体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关涉性别问题的组织系统,进而又强调社会性别制度内部对男女的差异化命名,最终又在这种种的差异化命名中片面选择那些具有性别压迫意味的部分。这一系列武断的减缩步骤说明她只是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怀疑前人理论所存在的男权主义嫌疑,这是一回事;能不能想当然地把这种嫌疑认定为事实,这又是另外一回事。盖尔·卢宾仅仅看到拉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释所具有的男权主义的意味,却无视拉康的成长理论在超越性别的意义上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和救赎情怀。同样,她只关注了列维-施特劳斯在社会交换层面对亲属关系所进行的分析,于是,她就以为以物品为媒介的交换和以女人为媒介的交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男权社会无情地置“女人”于“物”的境地。事实上,列维-施特劳斯只是描述了社会交换语境中的女人,这并不能推论出他就意识不到“女人”不可交换的自足价值。女性主义的盖尔·卢宾似乎不知道她欣赏的这两个理论家并没有反女性主义的故意。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观念使得盖尔·卢宾觉悟到性别压迫的文化指令无处不在地寓含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中,她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寓含在整体中的部分毕竟还有别于那个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盖尔·卢宾受益于结构主义的整体化致思方式,却最终犯下了见木不见林的错误。

三

《女人交易》这篇论文的精华部分是盖尔·卢宾对于列维-施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以及弗洛伊德、拉康关于女性俄狄浦斯情结所持的精神分析立场的重读和重解。她的这个再解读工作的确是富于创造性意义的。因为有了列维-施特劳斯所没有的女性主义视角,盖尔·卢宾就能注意到列维-施

特劳斯关于亲属关系的田野调查和人类学解读中所隐藏的一个意外却又普遍的问题——女人交换。同样，不同于心理医生抱着“正常化”的期待对其诊疗对象进行诱导和暗示，盖尔·卢宾质疑弗洛伊德从生物结构方面来解释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貌似自然化的解释实际上是文化强制观念的隐蔽性表达；也不同于拉康仅仅在女性俄狄浦斯情结背后找出文化指令的支配作用，盖尔·卢宾还批判了这些传统文化指令对于女性的压迫性质。透过女人交换这个问题，盖尔·卢宾惊醒到通常以财产为媒介来理解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关系在骨子里却意味着“各种人对其他人所具有的不同权利”，“女人的交换概念深刻地洞察了女人在其中对自身缺乏完整权利的一种制度”^[140]。透过女性屈服于乱伦禁忌和异性恋的心理驯化过程，盖尔·卢宾撇开拉康那个处于中心地位的、隐喻化和能指化的“男根”，直指它的喻旨和所指，亦即具有文化威权意义的“势”。在盖尔·卢宾的理解中，“有没有‘势’负载着两性地位的差异：‘男人’和‘女人’”^[143]，“‘势’不只是区分两性的一个特征，它是男性地位的体现。男人登上这个具有一定权力的地位——其中有对一个女人的权力。它是传播男性统治的一种表述。它通过女人落实在男人身上”^[144]。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盖尔·卢宾的两点理论贡献：其一，对于女性压迫的认知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那些具体的、显在的伤害性事实，因为女人被交换的客体命运和境遇更为普遍地被整个社会所谓正常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所掩盖；其二，女人在心理和精神上被阉割的境遇经由文化表象系统的合法化处理而成为丧失痛感的经验，女性主义批评更重要的任务就在于修复这种原初的和自然的痛感。当我们领受了盖尔·卢宾这两点启示的时候，女性主义批评就可以在广泛的文化批评和心理阐释的意义上展开了，这就摆脱了过去仅仅依靠或多或少的个别举证来进行道德抗辩的无力局面了。

然而，盖尔·卢宾的这些创见也仅仅使女性压迫问题从冰山一角变为整体化和系统化的显像而已。如果真正审视问题的根源和解决路径，盖尔·卢宾的理论弱点就严重地暴露了出来。恩格斯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365]而盖尔·卢宾则错误地认为：“妇女的从属可以被认为是组织与生产性和社会性别的关系的产物。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就是派生的第二位的。”^[140-41]她竟然会认为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性别制度，而是社会性别制度规定了经济的性别压迫性质。这就拒绝了从根本上来认识女性压迫的社会根源。既然对问题的根源认识错误，盖尔·卢宾也就不可能提出解决女性压迫这一问题的正确路径。她说：“女权主义运动必须试图重新组织性和社会性别的领域来解决文化的俄狄浦斯危机，这种组织要使每个人的俄狄浦斯经历不那么具有危害性。”^[146]在这里，盖尔·卢宾似乎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然而，性/社会性别制度一经确定，就不是那么容易重新组织了。盖尔·卢宾必须回答女权主义运动要重建社会性别制度需要怎样的有力依托。她的回答是“性/社会性别制度必须通过政治行动被重新组织”^[146]。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女性压迫问题，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绝不是问题解决的全部，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列宁早就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407]毛泽东同志也讲：“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463-664]相对于文化和政治而言，经济的决定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盖尔·卢宾的女性解放之路仅仅到政治为止，这显然并非根本性的女性解放之路。

女性解放实际上是整个社会解放的一部分，因而也只能在社会解放这个漫长而艰苦的系统性工程中展开。社会解放的根本在于解放生产力，从而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社会的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也便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这一基础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才能随之革命。性别文化和性别社会制度处于这种革命链条的低端；归根到底，它们还是被

经济上的革命决定着。物质技术的发展和物质活动的组织方式的改变会给整个人类的生活带来本质性的变化。现代枪械的出现大大缩小了男人和女人在战场上的差距,机械手的出现则大大缩小了男人和女人在车间里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两个半世纪以前的产业革命把整个世界拖进了现代化的轨道,从国内市场到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价值规律所寓含的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理念愈加凸显。女性解放就是要使女性完整地享有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现代性文明成果,因此,它也就不可能脱离至今尚未完成的、关涉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变革。

参考文献:

- [1]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C]//王政,杜琴芳.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On a Certain Groundless Feminist Theory

—Close Reading and Criticizing on *The Traffic in Women* by Gayle Rubin

Lv Baoti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essay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by Gayle Rubin is very famous as a kind of theory of feminism. However, its theory building was not a sound result of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theory resources. In researchful temperament Gayle Rubin is quite a radical formalist and postmodernist. Although her research method adopted in the essay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structuralism, ultimately she achieved her aim of deconstruction. Clearly, her thought course is opposite to that of Marxism. To a great degree, she had manipulated the thought heritages of predecessors and had used them out of the right contexts. Because she tended to exaggerate “the sex/gender system” as the very core of the whole society, she regarded it as the ultimate cause of women’s oppression. Therefore, she planned to eradicate women’s oppression only aiming at “the sex/gender system” and regardless of the whole social material basis. In a word, both her integral theory design and her specific demonstration can hardly make her able to cook up a convincing explanation.

Key words: Gayle Rubin; “the sex/gender system”; feminist;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psychoanalysis

(责任编辑 王作)